

学问之道

“学问之道”栏目共五个讲座，都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讨论翻译学者（包括翻译教师）如何能在学问的本源点上树立一种正确的治学态度与价值取向，从而使自己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或翻译教育岗位上可持续地站得稳、看得远、做得实。这五个讲座隐含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说到底，做学问与做人应当是统一的，即一个人若学问真正不断精进，其人生境界也必然随之得到提升。

道器兼治， 龙虫并雕

——谈翻译教师 / 学者之佳境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从一个理想的角度出发，与大家讨论：作为一位翻译教师或翻译学者，究竟达到一个什么境界方算是比较完美，同时也令学生真正感到满意、甚至佩服。实事求是地说，当下我国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的翻译教师群中，真正达到我题目八个字境界要求的恐怕为数不多，我本人就没有完全达标。但是，人总是要有追求的，翻译教师 / 学者也不例外。驱使这种追求的是翻译事业包括翻译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是个人专业或业务的不断精进。同时，这一追求也是我们教师教书育人要取得出色成果所不能或缺与停顿的。

下面，我先就“道”与“器”在概念上作个界定与解释。

道

原字形意为“人疾行于道上”，后来其意指逐步得到延伸：

道 → 道路 → 方向 → 途径 →

道理 → 合乎事理的标准 →

思想，学说，主张…… →

很显然，这里所谓的“道”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

明代医药巨擘李时珍曾这样说：

“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本草纲目》

这里“用之于卫生”指的是微观层面，“推之以济世”，所指就转为宏观了。同样，

“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

这句话就是从宏观到微观来审视医生的作用。这句话至今仍不失其深刻的启示意义。同样，翻译之道也可有宏观与微观的指向。

翻译之道（宏观）可指：

- * 对翻译本质的认知
- * 翻译的一般理论，其涵盖面可涉及：语言学、哲学、文化学、文学及其他相关社会科学（对中国学者而言，还涉及传统文论，包括文章学及广义艺术论等）

翻译之道（微观）

主要指具体翻译操作的经验性总结与体悟

器

原字形意为盛肉的容器，引申为→

具体做事→人的才干：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易》

翻译之器可指：

1. 翻译操作的各种技能与方法，包括词、句、篇各层面的操作；并可以具体到文学、科技、商务等各类文本的翻译之中；
2. 翻译技术（机器翻译操作、计算机辅助翻译、相关硬软件开发与运用、语料库建设与运用等）

“道”与“器”的关系一般表现为

先治“器”，再治“道”→

由“器”悟“道”→
以“道”驭“器”
以“器”兴“道”
“器”不利，则“道”难明

“器”之相关外延因人而异：如电脑技术，软件开发，书琴棋画等才艺。

就翻译而言，强调先治器而后治道，意思是先要在翻译的实践层面有大量投入，取得较丰富的翻译经验，方有可能认识、提炼相关的翻译原则与策略，方可有资格讨论翻译的策略乃至理论问题，由此在继续的翻译实践中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反过来又作用于翻译水平的提升。这种道与器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可以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也是上图中所谓由“器”悟“道”，以“道”驭“器”，以“器”兴“道”的含义所在。这种循环往复的理想结果是，翻译者的视野越来越宽广，翻译的走笔更加手心两畅。

因此“器不利则道难明”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人要想严肃地谈论、研究翻译，特别是谈论、研究翻译的原则或理论问题，没有自身一定的翻译实践恐怕只是不根之谈与不根之论。至于“器”的延伸，当然可以因人而异。下面请看一段引文：

夫为学之轨辙者，则曰下学而上达，即器以明道也。非下学无以上达。下学者，读书以考文；上达者，通经以明道。故戴氏东原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程水金（“正学之门”2014-03-16 国学网）

我在此引一段如上的话，是想再延伸一下正确理解与处理好道器关系对从事翻译的人之重要性。特别是这段话的最后一句：“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我以为至关重要。从事翻译，最最基础的是文字、文词过关，即首先要真正识字、识词，在此基础上再锻炼遣词造句的能耐。只

有在跨过了这两个门槛后，方可能稳健提笔做翻译。

翻译在“器”的层面最基本的是要三个方面过关：

1. 英文已较纯熟道地；
2. 汉语已有相当的修炼功夫；
3. 英汉 / 汉英翻译已熟练掌握相当的方法与技巧；

（以上三条应是经得起核查或检验的）

上达固须下学，而下学未必即可上达。舍器固无以明道，即器亦未必道易明。学者夙夜勤劬，著述满家，不过短钉獭祭，终身言之而未尝有言也。何则？见木而不见林，能博而不能约，昧于立言之宗旨，闇于章句之家法，陷于淫辞，无所归趣，不知道为何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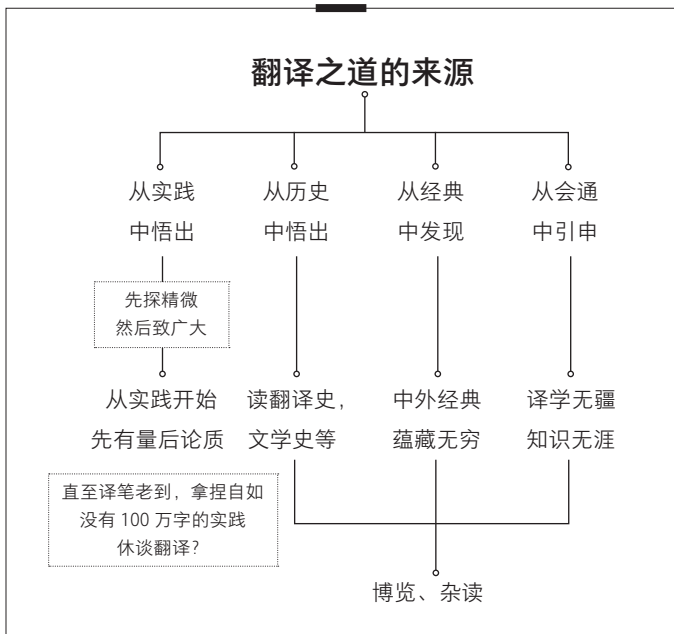
（来源同上）

我之所以要再引一段程水金话，是想提醒一下，在强调必先治器方可治道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有了器的资本就自然而然地去获得道了。这里面既有方法问题，更涉及悟性问题，还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条件等。同样做翻译研究，为什么有的人做得出色，有的人显得平庸？原因就在于此。“学者夙夜勤劬，著述满家，不过短钉獭祭，终身言之而未尝有言也。”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这种现象恐怕在我们的翻译研究界有一定的普遍性，要真正悟得翻译之道诚非易事。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技术（IT）、大数据（Big Data）概念与技术、人工智能（AI）等接踵而至，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与工作模式，甚至要影响到人类如何生存的前景。我们可能还要准备从这些技术飞跃的现象中去探求新的相关的“翻译之道”。

中国在传统上讲似乎一直是重“道”而轻“器”的。直至晚清，列强入侵之后，似乎又走了另一极端，即重“器”而轻“道”。这一倾向在中国近现代的翻译研究领域又似乎显得尤其明显。这恐怕也是造成我国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落后于西方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话题很大，是可以专门再另行讨论的，我在此不作展开。下面是一个图表，表示我对翻译之

道来源的理解。



因为我们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翻译、研究翻译，不可避免地对翻译之道给以更多的关注。这里对于所谓翻译之道的来源作个探讨也许是有益的。我从自身的治学过程中体会到，翻译之道主要是悟出来的，并可从四个方面来悟成：

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参与到翻译实践之中去，从实践中去真切感悟什么是翻译，怎样做翻译。翻译之道的获得，必须先亲历翻译，而不可能走先验之路。在自己大量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在反复的比较中，习得一定的翻译技巧与策略，从第一手资料中总结出翻译的体会，并将它们组织成带有归纳性的语段。这是一条先探翻译之精微，而后再逐步至广大之路的初始阶段，也是我国绝大多数翻译学者，包括当今一批享有名望的翻译学者最初走过的历程。翻译实践的体验对翻译之道的获得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这一点恐怕是我国老一辈翻译家/学者的共识。已故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翻译家陆谷孙曾说过，没有一百万字的翻译实践，休谈翻译（亦即没有资格谈论翻译之道）！这一条，我想无论中外译界都应是有共识的。下面，我

想举一些实例，来领略一下一些西方翻译大家或翻译的著名学者从实践中体悟出来的若干翻译之道，读来颇觉精彩，很是耐人寻味，且多为不刊之确论。（所附的中文译文是我所为，仅供参考）：

——

The translator is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appreciate the “total” difference between one language and another. He himself usually knows that he cannot write more than a few complex sentences in a foreign language without writing something unnatural and non-native, anymore than he can speak one. He will be “caught” every time, not by his grammar, which is probably suspiciously “better” than an educated native’s, not by his vocabulary, which may well be wider, but by his unacceptable or improbable collocations.

(Newmark)

译者最能体味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整体”区别。他本人通常知道，他用外语写不上几句复杂的句子就会出现不自然、不道地的情况，更不用说张口说外语了。他每每会被人发现“出错”，倒不是他的外语语法不行（相反他的语法似乎还可能让人觉得比受过教育的外国人还要好呢），也不是他的词汇不充足（他的词汇量极可能很大），而是他的词语搭配不能让人接受，甚至怪诞可笑。

——

I say that the full power of a translation resides in the fact that what is written in one language should be well translated into another. Nobody can do that well unless he has an experience of both languages that is both wide and deep. But that is not enough, since many people are eminently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ough not of explaining, just as many people are able to judge a painting correctly even if they themselves do not paint, or just as many people are able to understand music without being able to sing.

(Leonardo Bruni)

我说翻译的全部力量在于，一种语言所写的东西应当很好地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无人能把这件事做成功，除非他对两种语言具有既宽又深的体验。但是仅此还不够。因为许多人有出众的理解力，然而并没有出众的表述力，正如许多人不能作画，却能准确地鉴赏画，也正如许多人能理解音乐，却不能演唱一样。

When I speak of a prose translation I don't mean a servile translation. What I mean is a generous translation, a noble translation that clings closely to the ideas of its original, tries to match the beauty of its language, and renders its images without undue austerity of expression. The first type of translation, the servile one, becomes very unfaithful, because it tries to be scrupulously faithful. It ruins the spirit by trying to save the letter. It is the work of a cold and sterile talent. The second type of trans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tries above all to save the spirit, does not fail to keep the letter, even where it takes the greatest liberties. With its daring features, which remain true always, it becomes not just the faithful copy of its original, but a second original in its own right. It can only be the work of a writer of genius: solid, noble, and productive.

(Anne Dacier)

我说的这种散文翻译并不意味是亦步亦趋的翻译。我指的是一种宽松的翻译，一种大气的翻译，既紧守原文的思想而又全力匹配原文的语言美，并使原文的意象在不过分拘谨的情形下得以表达。第一种翻译，即亦步亦趋的翻译，因刻意追求忠实反而变得非常不忠实，这种翻译力保字面意思而毁了精神。这是冷漠、缺乏想象力的译手所为。第二种翻译，以设法保留原作精神为第一要务，同时把握住单词的意义（即便是在极度发挥之处也不忘记这一点）。这种翻译自始至终以大胆传神为特点，不仅仅是原作的忠实的翻版，而且本身还成了第二原作。这样的翻译只能出自功底深厚、词章宏丽、文思泉涌的天才译手。

The translator shall love words, love language; and that he ought to possess that intellectual curiosity upon which he can

build a broad general culture. For without that culture he will not begin to seize the whole of his author's text.

(Lewis Galantieri)

翻译家必定是热爱文字，热爱语言的，他必须要具备知识上的好奇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宽广的通用文化来。若无这样一种通用文化，他就不可能全盘掌握原作者的文本。

In most cases translators do not reject outright, but rather rewrite, both on the level of content and on the level of style since, as the Earl of Roscommon observes: "Words in one language eloquently used/ Will hardly in another be excused."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can therefore be shown to be not just, or even not primarily a matter of matching on the linguistic level. Rather, it involves a complex network of decisions to be made by translators on the level of ideology, poetics, and Universe of Discours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 p. 35)

在许多情况下，译者并非完全摒弃（原文），而是在内容与风格层面上进行重写，诚如 Earl of Roscommon 所说：“一国文字中流畅动人的词语，在另一国文字里几乎会是不知所云。”翻译之中的“忠实”因而证明不只是，甚至根本不是在语言层面上的一件匹配之事，它涉及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话语世界层面上译者作出种种决断的一个复杂体系。

Translation is thu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 relative concept (It should be) said that every translation represents a transpo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e linguistic view of the world to those of another and that this cannot take place entirely without changes or metamorphoses.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p. 41)

翻译因而将继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以说每种翻译都是从一种语言世界观角度向另一种语言世界观角度的转换，而这种转换若不伴以种种变化或变异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

意义蕴藏在原文词语的深处。原文读者显然远非按词典定义索意，但翻译者必须将原文中的隐含意思表达出来。原文读者或听者一般都能迅速理解这种不直露或半露的含意。他们由于下意识存在的那种对自己文化的熟悉（语言及语言环境），使得说话与写作中基本的含蓄与经济成为可能。而在翻译过程中，意义的这种承继、压缩多多少少都会消失掉。翻译基本是解释性的，且尽可能图像化。翻译者追求的是把不言而喻的东西展现出来。因为翻译具有添加性质，所以翻译就具“通胀”性，总要“超溢”原文。

（译自 *After Babel* p.291）（英文原文过长，略去）

其次，翻译之道的体悟可以在阅读中西翻译史中直接或间接获取。这当然应是在前面所讲的自身翻译实践已有相当积累的基础上才进行的。这方面的书籍与资料现在坊间不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如 George Steiner 所著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中就有一节阐述西方翻译与研究走过的四个阶段，它们对我们从宏观上认识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如何改变人们的翻译态度与取向具有启示意义。具体可以参阅该书（p.248-252）。除了阅读翻译史之外，相似的翻译之道也可以从文学史、语言史等书籍里获得，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再其次，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文献著作中去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翻译之道，因为它们常常是言简意赅，意味深长。例如，康有为曾说过“吾眼有神，吾腕有鬼”这样一句话。原来康有为曾跟同乡朱九江学书法，朱教他如何执笔、运笔。康有为练习勤奋，白天用手指与手腕作各种提、按、起笔和收锋的姿势，夜晚还用手画被褥，以期悟出道理。但他还是常自叹自己运笔功夫不到家而说出这样一句话，意思可以理解为：我虽然能够鉴别书法的优劣，但要我自己临砚，提笔运腕就不听使唤了。

康有为这里道出了一个对我们学做翻译的人也颇有针对性的道理：我们可以对别人的翻译评长论短，但一旦自己做翻译很可能一下笔就出问题。能评鉴翻译的人，不一定是自己能做像样翻译的人。其实，再细究康有为的这句话的来源，可以发现，此

话并非康氏的专利，而是从明代朱国桢撰写的《涌幢小品》中引过来的：

王弼州不善书，好谈书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自聪明人说话，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鬼岂独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真是何等神明也。此说一倡，于是不善画者好谈画，不善诗文者好谈诗文，极于禅玄，莫不皆然……

又如，明朝大学者朱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心里闹，如何见得！

（朱熹：《清邃阁论诗》）

这对于我们当代学习翻译的人也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凡是真想学好或做好翻译，非要把心静下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才行。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知识与阅读的汇通中来获得翻译之道。这样的翻译之道或许是更加宏观，更加深刻。我这里所说的汇通也就是知识的融会贯通。而融会贯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知识界做学问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文、史、哲不分家。这一点，对我们做翻译的人，思考翻译之道的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翻译与翻译问题所引出的思考往往是跨学科性质的，决不是仅仅囿于翻译而已。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论文献里，强调求知识、做学问要在博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的论述不知有多少多少。这里稍举几例：

欲求超胜，必先会通。

（徐光启）

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

悖，是谓通儒。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学诸书》）

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

（叶适《水心文集·赠薛子长》）

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

（裘沛然）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中，多为通儒。比如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钱宾四、钱锺书，等等。

中国学术史自古就有专家与通人的区别。专家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当时后世。

古代的通儒是能通古今。现代的通儒还要通中西。打通、会通、兼通，才能产生思想。通儒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

中国现代学术还有学者能诗的传统。通儒均是货正价实的学者兼诗人。

（刘梦溪）

正因为翻译与翻译研究涉及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在悟翻译之道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领域发生联系与联想，而这时知识的汇通将会对悟道的深刻起到关键作用，因为能汇通者其视野必定比较宏阔，其识见因而总能胜人一筹。在这方面，中国当代著名学者许嘉璐先生有一段话对我们就很有启发意义：

如就医言医，则终将陷于狭，沦于滞；必也，放眼中华文化，广览要典，直悟中医之根，方可渐登岐黄之堂，或曰首明其道，继之以砺其器耳。

（许嘉璐）

如果将许嘉璐先生的话套用到翻译与翻译研究领域，当然也

可以成为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的翻译之道：

如就翻译（技巧）言翻译，则终将陷于狭，沦于滞；必也，放眼中外文论、译论，广览要典，直悟翻译之本质，方可渐明翻译之事理，走入翻译之佳境，或曰首明其道，继之以砺其器耳。

当然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急求不得，功到自然成。

上面讨论到的两点，即从古代文论、译论中汲取营养，从融会贯通中悟得道理，都需要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掘有价值的东西，而目前，我国翻译教学与研究界（推而广之，整个外语教学与研究界）却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许多人在对自己国家的文字及其文字文化知之不多的情况下，在学习、研究翻译问题的，现在我们见到的大量文著似都只能以西方语言学或翻译理论说事，根本悟不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与需求的翻译之道来。这也是我们难觅高质量、原创性翻译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老一代的著名语言和翻译专家多为学贯中西，一生学术（包括译与研）成就卓著者。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的学养深，国学基础（包括汉语的文字素养）厚实，而后者恰恰是他们做学问的底气所在，也是他们具备不凡批判眼光的原因。

无论是翻译之治器还是治道都是要下苦功的，翻译教师/学者如仅知（求）道而忽视治器（练艺），或者只存道于心，而不形于手（笔），那他/她就不是一个理想的翻译教师或学者，最起码在翻译的课堂上他/她就很难站稳脚跟。

以上是我对道器兼治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下面让我转向“龙虫并雕”这个子题目。

龙

传说中大口长身，威力巨大的神异之物；

中国先民的早期文化景象错综复杂，“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一个象征符号：

身似蛇，头如虎，脚如羊，鳞如鱼，爪如鹰，在天上地下水下都可运行自如，充满活力与创造力。变化无穷的龙体现的是多元综合的精神。

《文心雕龙》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

（“文心”是讲作文的用心）

“雕龙”：雕刻龙文（纹）：讲究文采，树德建言，留传后世。

盖《文心》之行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文心雕龙》的写作，在根本上探索到道，在师法上仿效圣人，在体制上探源经书，在文采上酌取纬书，在变化上参考楚骚：文章的关键，也可以说探索到极点了。——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

“雕龙”在今天或可以泛指

1. 写篇幅较长，系统性较强的分析研究型学术文章，并附权威可核查的参考文献；
2. 从事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3. 硕士、博士论文写作；
4. 翻译鸿篇巨制。

虫

（与龙之大相比较）言之小也。

也指虫书（古代童子雕虫篆刻），非成年人的玩意儿；“虫鱼”（“虫鱼之学”）指不入流的文著或研究，含轻视之意。“雕虫”常喻不足道的小技艺。

“雕虫”（在翻译方面的写作）可指

1. 写翻译具体操作（或翻译教学）方面的点滴经验总结一类的感悟性文章；
2. 撰写一般的翻译技巧或方法的探讨小文章；
3. 发表翻译的一得一孔之见及类似的散谈性文章；
4. 其他自由撰稿诗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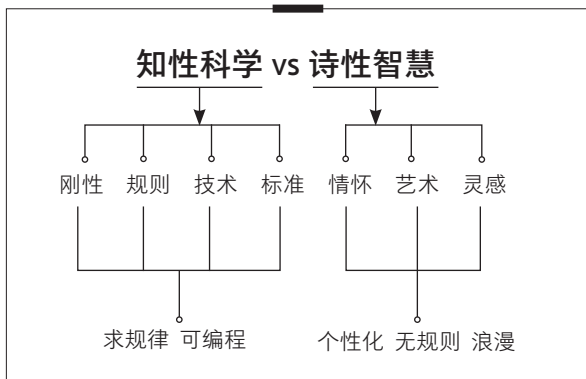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无论是翻译学者还是翻译教师，“龙”“虫”是可以并雕的，且能相得益彰。

在此我想对龙虫并雕的相关问题谈一些引申性看法，或可引起大家的进一步讨论、思考。

- 一、文章无论“龙”“虫”，都得“雕”而后方可读，这就意味着写（译）须注重文采，而文采乃是中国文字，中国文化的文脉所在。
- 二、文字表达与口语是有区别的。言是言，文是文。平时说话是一种表达体系，提笔写作（包括翻译）就进入另一种表述体系，即所谓“雅”的表述体系，更讲究章法、逻辑、修辞、乃至音韵与节奏等，都得用心对待。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等的论文著作均属雅言，其中许多至今读来依然文采斑斓，可谓千古不朽。
- 三、文采的基础是个性，体现个人的文字与文学修养，这与作者长期浸染诗书，与文为伍密切相关。
- 四、现在我国的学术论文，尤其是人文社科类文章似都有轻视文采的倾向，正在逐渐淡化文采，有时甚至到了完全不要文采的地步，取而代之的是对所谓“格式”的强调，古人崇尚的“文章须出自机杼，成一家风格”的撰文之道好象要中断了。不少发表的文章似已“无我”，更遑论本可跃然纸上的作者的胸襟、情怀、思想与才情。这是不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呢？

我以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必然是思考周详，探微致广，走笔激昂，文采沛然，彰现个性的作品。在这方面，中国现当代的文人宏匠与学界巨擘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讲究文采本质上就是不能忘记文章的个人风骨。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在“道”与“器”之间、“龙”与“虫”之间一个正在日益凸现出来的问题，即在科技日益昌（强）盛的时代，我们正面临一个知性科学与诗性智慧如何能各得其所的难题：



我上面的这张图表想说明的是，我们常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并不准确，不能将人文与社科混为一谈，捆绑在一起对待。社会科学可与自然科学形成对应或对照，但人文不应称为科学，称之为学科可能更妥当，因为凡被称为科学的东西一般要受刚性规则约束。而人文作为一个学科，充满诗性与艺术性，甚至还有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刚性与规则很难驾驭。翻译也是如此，传统上来讲，翻译本身一直是艺术，或者说有其艺术属性，尽管翻译研究可以采取科学的方法（对此奈达、纽马克等学者早都有明确论断）。如何处理好知性科学与诗性智慧的关系是我们当代翻译工作者，翻译教师（研究者）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希望能看到听到业界同仁，特别是年轻学者的真知灼见。

最后顺便提一下我觉察到的现在的人文学科的一种新景观，也请诸位思考究竟应如何看待或对待。

现在的人文学科出现的新景观：

- 一、学科带头人（包括系主任 / 院长）大多本人不是诗人或作家，或者说，他们之中已鲜有为文者；
- 二、学科骨干大多只具专业知识，懂得专业规范，知晓流派、熟稔网上搜索信息资料，习惯写格式论文，却不善长舞文弄墨（创作），少有甚至没有文人气质；
- 三、人文学科趋功用化、技术化、产品化，强调与市场接轨，众多的类似“应用 × × 学”由此而生；
- 四、传统的人文学科依赖文字（纸质印刷品），现在更多的图象、视频、多媒体手段介入（学科交叉？）。

面对这些新景观，我们做翻译、教翻译的教师 / 学者应抱什么态度，倒是一个很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作为翻译学者恐怕有几点是应牢记在心的：

- 一、翻译本质上是为文，是创作，是艺术行为；
- 二、文字功夫的锤炼是翻译者永远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对“诗性智慧”的探究与阐述更是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即使在大数据时代，在技术化的浪潮下，我们仍然不能忘却这一点；
- 三、翻译研究涉及学科（学问）的交叉融合，因而广览群书，博观约取应为学术常道。

我以为，理想的翻译教师 / 学者应当努力争取达到“胸襟高阔、识趣超胜、义理富赡、笔势刚洁”这四重境界。

译论拾贝

Among the many engaging metaphors applied to translation, perhaps the most suggestive is the one that compares it to “being kissed through a veil – exciting contact of a sort, no doubt, if one has never been kissed directly.” The perception of the bride of one’s desire through the gauze of a veil – whether chiffon or lace – underscores the sense of anticipation, and frustration, that translations instill in the reader bent on reading a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The Transparent Eye* p. 79)

名状翻译，佳喻颇多，隔纱接吻一说极具意味，可令童男处女砰然心跳。透过一层薄纱或丝巾来感触心仪之新娘这个比喻，凸现出一种期待感和受挫感。而这两种感觉在专心阅读翻译作品时是体会得出来的。（何译）

翻译研究者 治学基础纵谭

今天我讲这个题目，首先要说明两点。

一是，翻译与翻译研究虽有联系，但从性质上讲不是一回事。有的人搞了一辈子翻译，但可能对翻译的研究并不沾什么边，而有的人搞翻译研究，文著颇可观，但出自自己笔下的翻译作品或产品极少，甚至不译一字。这两种现象均是客观存在的，或许有其合理性。

二是，就翻译研究而言，还可分为狭义研究与广义研究。前者基本聚焦翻译的技术层面，专事琢磨翻译的微观问题，特别是字、词、句转换的技术处理；后者则是跳出翻译的技术层面，关注翻译的其他相关问题，诸如翻译的本质探讨，翻译的文化因素，翻译史，翻译的心理过程，翻译美学，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政策，翻译人才培养，等等。我们平时所说翻译研究具跨学科性质，基本指的就是这些跳出翻译技术层面，对翻译问题进行诸如在哲学、文化、历史、心理、美学等领域里的研究与探赜。这也是为什么说翻译研究在今天已经不是传统外语（翻译）院系的专利，且真要搞这类研究，并搞出一点名堂来，目前格局下的外语（翻译）专业并无大的优势，因为外文系科现有的人员构成对这类研究所需的学养与能量积累是大大欠缺的。

我作为一名英文与翻译教授，在此一开始就说了这番有点丧气的话，似乎也不应该。不过，做学问搞学术，首先要直面真情实况，实事求是地去对待要研究的对象，却是必须的。我的这番话权且做为一个引子吧，无非想强调如下几个观点：

1. 翻译研究在当代是一个跨学科领域，不是单凭懂点外文或搞过一点翻译实践就可以有资格进入的，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2. 就从我国外文（或者其他人文社科）系科的学术史来看，真正从事翻译研究有成就、有贡献者，除了兼备中外文的良好基础之外，更具有相当的人文、社科的通才视野（在当今时代，当然还应增加科技知识素养），这也已经为中外翻译研究史中的众多范例所证明，亦是不刊之确论。
3. 就以中国近现代的翻译研究大师级人物为例，严复、林语堂、钱锺书、王佐良、许国璋等，都莫不以深厚的国学基础、广博的文史哲修养、中外文的笔走龙蛇能耐而为我们留下珍贵的研究遗产，他们的相关学术成就之所以名播海内外，就是他们的研究的确体现跨学科的气势与风采。

今天，我们的翻译研究现实有着许多与过去不一样的境况。其中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我们搞研究翻译的学者，大多（包括我本人在内）开始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之时并不（甚至根本不）具备应有的人文社科识见基础，即不具备一般的通才视野或能力。这就是我们搞翻译研究时，常常会显得捉襟见肘、底气不足的主要原因。

当代人文社科学科的不断细化造就了比以往时代更多的所谓专家，但是通儒式，全才式的研究大家（如熊十力、钱学森等）却已难再产生。而 21 世纪的翻译研究趋势（其他学科的发展趋势亦然）却要求研究者回归学科交叉融合之路。翻译研究的新进展离不开翻译研究人才的重塑。因此，对我们多数人而言，首先或要在理念（认知）上来点“补课”。在此我就先现成稍引几段文字供诸位参考：

中国文化向来是文史哲不分家，翻开老一辈学者的著作，看到像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这些大家的著作，都让人感受到一种融会贯通。他们在每一个领域中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们成长的环境与我们完全不同，几乎每个学者的国学基础都非常扎实，然后再来选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他们的文章里

都可以展现出来。饶公（即饶宗颐先生）也是这样，他最初的“童子功”就是熟读中国的经典，这里就包含了文史哲最经典的作品，有了这份文化垫底，他将来选择哪一个门类都可以胜任。我曾问饶公：“如果人生可以有第二次选择的话，您会选择什么呢？”“我还会选择文学，当我一出世，就觉得自己身上带着文学母体的深深烙印，我今天的一切，都源自于文学的根基，它给我生命的营养、灵感、智慧。”

饶先生历时半生，成书六十几种，论文近六百多篇，遍涉历史、考古、古典文学、古文字、佛教、艺术，在这广阔的文化领域，实在很难将他真正归属于哪家，他自己诙谐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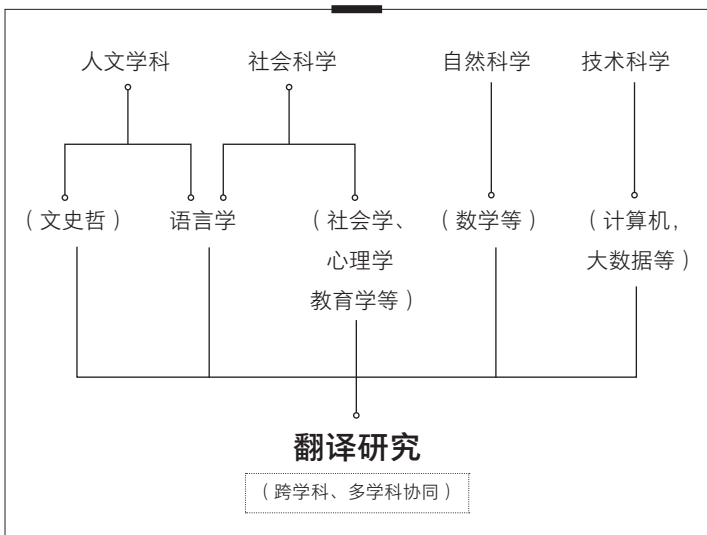
21世纪，随着国际潮流的影响，当下学术越来越像画地为牢，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学术视野走得也越来越狭窄，现在的学者很难像饶先生那样文史哲、诗词、书法、绘画都达到如此全面贯通。这里给我们提出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化教育和环境条件比较以前，有哪些差别呢？饶公的离去，留给我们对中国文化更多的深思。

（摘自《综文史于一途，辨道艺非两歧》

沈建华《光明日报》2018/2/7）

当然，当今时代也许难再产生像饶宗颐、季羨林、钱锺书式的大师级人物了。但是他们“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曾国藩语）的为学之道，仍是我们应当学习与继承的。我们外文（翻译）院系专业真正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仁，尤其是青年一代才俊，一定要清楚认识到这种为学之道的真正长远价值，从而下定决心，打好学术基础，夯厚研究平台，以期日后能做出扎实而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在谈论翻译研究时，有一个问题也会时常被问及，这就是，翻译研究究竟是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或者还有其他界说？我对此的看法用以下方式作一图示：



翻译研究现在已经是一个开放且包容度极大的体系，整体而言，它可以是一个各种学科的学术合众国，其中的各脉各枝（当然还可以延伸出分脉分枝）相对独立，也可以相互渗透或关联。大致说来，传统的翻译研究（大约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无论国内国外，基本都属于人文学科；二战后，西方语言学及一系列社会科学介入进来，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框架，让人文与社科共享翻译研究领地；到了机器翻译时代的来临，技术软硬件的闯入，又使人文与社科共治翻译研究的状态被打破。此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种类的介入与参与，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与人工智能迅速崛起，正席卷式地改观整个翻译研究的版图，以前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也因此经历着某种嬗变。整个翻译研究的图景今后会怎样演变，恐怕谁也难以说得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翻译研究中的核心因素，即文字、文化、文学、艺术、美学等，不会也不可能消失，那么，翻译研究中的人文理念、人文因素始终还是居于高点的。

我们作为翻译研究工作者，既要面对研究的现实，看到发展变化的趋势，进而不断学习，与时俱进，又要根据自身的兴趣与特长，并结合具体的有利工作环境，有选择性地翻译研究的选题。盲目跟风，人云亦云，都是我们搞研究做学问时要避免的。

现在，我可以回到今天的正题上来了。翻译研究的治学基础

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下面的内容完全基于我本人长期研究与实践翻译、教学翻译及培养翻译方向硕士生与博士生的经历总结而成。

一、读原著（digging into the original work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搞学问做研究首先当然是读书，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读什么书，如何读，并不是一件人人都能解决好的事。我们做翻译研究的人，理论上讲，应是精通中外文的，因此我们要读的书也必须也要涵盖中外两种文字。就读书而言，我特别强调读原著，我在此用英文表述 digging into the original works，即是“细品原著”。这一条现在看来也不一定人人都能真正做到，因为这其中还包括要做读书笔记，甚至要在原著上面不时地圈圈点点（这包括对原著的赞许或质疑等），一句话，读书要下细功夫，进入一种境界。除此之外，读书还得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网上的、别人写的（或介绍、翻译过来的）东西都不能替代自己的阅读，且要坚持读纸质书；凡有原著能找到的，一律不读翻译文本，除非你有批评或比较的意图。同时，要立戒浮躁，真正读懂、读透特别重要的几本书，作为自己研究的最基础认知来源。

二是，所谓细读原著，还应包括必要的重读。这是因为，一些重要的理论书籍，读一遍，或者只是浏览一遍，一定是不够的，不大可能把握或发现书中的精髓。对此，钱锺书先生说过一句话对我们是有极大启发意义的：

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
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钱锺书（《文汇报》2008/10/3）

三是，一定要明确，读原著是硬道理。因为不认真研读原著，理论与认识上的新发现、新探赜都无从谈起，也很难对一些问题或观点提出严肃的质疑或不同的看法。举一个我个人读书时曾有过的一个质疑例子。在翻译界我们大家都熟知这一说法：

“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

对这句话学界或译界似乎一直都是持正面评价的，即它形容搞翻译是如何的不易，如何的吃力与艰辛，它描绘的似乎是译者的负重前行或忍辱负重爬格子的形象。直到我细读英国著名诗人、戏剧家与翻译家 John Dryden (1631-1700) 的有关翻译研究的文著才发现对这句话我们或许大有误解或误读。众所周知，Dryden 曾提出对翻译的三个分类：

Metaphrase (死译), Paraphrase (活译), Imitation (摹创)。
其中，他对 metaphrase 作了如下的一个比喻性的描述：

(Metaphrase) 'Tis much like dancing on ropes with fettered legs: a man may shun a fall by using caution; but the gracefulness of motion is not to be expected: and when we have said the best of it, 'tis but a foolish task; for no sober man would put himself into a danger for the applause of escaping without breaking his neck.'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edited by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8.)

(逐字)翻译颇似戴着脚镣踩着钢丝跳舞：为避免掉下来，钢丝上的人会小心翼翼挪动舞步，但就别指望此人会有优美的舞姿了。尽管我们说如此跳舞何等不易，但它终属愚蠢之举。头脑清醒者是决不会因幸免摔断脖子获得喝采而去冒这种险的。

(何译)

很明显，Dryden 对“死译”或者说“逐字译”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没有其他可靠来源的情况下，我认为 Dryden 的上述一段极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翻译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最初出处。也可能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在中国的语境下，几经多人转引，这一翻译比喻遂由原来的一种嘲讽转换成了某种赞许之意。如果是这样，则真可谓有点郢书燕说的味道了。

(The third translation) seeks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identical with the original, so that the one would no longer be in the stead but in the place of the other.

(Robinson, Douglas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问。这个问题在我国的译界与译学界似乎总被人频频提起，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许多提问者并没有好好地去读读原著原文，或者是读原著原文时太粗枝大叶，没有很好领会相关的论述意味。下面的具体引述都出自我国翻译研究者都耳熟能详的文著作者。我相信，只要我们对他们的代表作细细阅读过，就不会再去问“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这样的问题了！

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引出的问题：

奈达（Eugene Nida）应从未说过“翻译是科学”这样一句话。他强调的是“对翻译的过程可进行科学的研究”：

I have always tried to distinguish clearly between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which can and should be done in a completely scientific manner and the actual activity of translating, which I have often referred to as essentially a skill or art.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p.280)

纽马克（Peter Newmark）也从未笼统说过翻译是科学或艺术之类的话。他对此问题出言谨慎、细致：（下面我引他两段话）

All texts may be regarded by the translator as an amalgam of standardized and non-standardized languag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is that for standardized language, when it is used as such (but technical terms often melt into ordinary language—e.g. “fail-safe”, “parameter”), there should be only one correct equivalent, provided one exists, provided it is used in the

same situation by the same kind of person, and that is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Whilst for non-standardized language, of whatever length, there is rarely only one correct equivalent, and that is the art or craft of translation.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p.16.)

所有的文本在译者看来都是标准语言与非标准语言的混合体。这两种语言是有区别的。标准语言只有一种正确的对应，但前提是，第一，存在这样一种对应，第二，它由同一类人在同类情景中使用。这就是翻译的“科学”。而对非标准语言来说，不论其句段长短，只存在一种对应的情况十分鲜见，这就是翻译的艺术或技艺。

(何译)

In the most general theory, the translation of language relating to animate and inanimate objects, appearances and processes in the visible world should be a science, since the referents are more or less measurable, whilst the translation of language relating to concepts or colouring physical phenomena affectively, not being measurable, should be an art.

(Ibid. p. 136)

有时，细读原著还会带来意外的发现，尽管这种发现可能微不足道，但只要是你的发现，别人尚未察觉到，也可视为值得记忆的收获（见下面关于钱锺书化境说一段）。总之，读原著是硬道理，这句话对我们搞研究做学问而言，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钱锺书先生关于翻译“化境说”的一段话：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神依然故我。

《林纾的翻译》

钱先生在其文章的注释中说明，这位 17 世纪的英国人为 George Savile。而且还顺便提及了另一位德国人 Ulrich v. Wilamowitz-Moellendorff。在阅读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 这本书时，我发现钱先生文中“躯体换了一个，而精神依然故我”这句话，实际似应出自 20 世纪的 Moellendorff:

To put it in more cutting terms: the soul remains but it changes bodies—true translation is metempsychosis.

(p.169)

27

关于读原著 (digging into original texts)，我在此还要特别补充一个例子。《中国翻译》2013 年第三期刊登我国老一辈著名翻译家兼翻译学者郭建中的一篇文章：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中译辨正》

我向大家推荐此文，它真的值得细细一读，因为它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如何真正读懂、弄通经典原著的典范。作者从一个不起眼的英语不定冠词的使用，发现了我国学者群中长期存在的对泰氏一个重要观点的误解（曲解），发人深省！我由此联想到，在我国的译学界，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甚至不怎么读书也在做所谓学问的现象恐怕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诸位同仁，让我们读了郭先生的文章后都能力戒好读（引）经典而不求甚解之风！

二、厚基础 (laying a solid academic foundation)

我们外文系科出身的人，做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翻译研究，光凭一点外文知识与实践是断然成不了事的。因此必须加厚自己各方面的基础，尤其是要对其他学科知识尽可能有广博的涉猎；具体说来，最要紧的是下面的这“三个要”：

要关注人文、社科、科技（杂学）等方面的变化与动向；

要在国学、文化、历史、诗文、思想等领域不断积累知识；必要的记问之学不能少。

要抽时间读些中国文论（译论），有选择地读（研究）一些先秦两汉的文著。

最重要的是，中文的底子要打得比较厚实。现在汉语使用中的积非成是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例如下面的成语频频被误用，大报大刊，国家级的媒体节目有时也不能幸免。

七月流火（并非形容热）

名列三甲（并非前三名）

空穴来风（严格意义上，不能说“并非空穴来风”）

目无全牛（比喻技艺已至出神入化的境地）

差强人意（并无贬义）

炙手可热（是个贬义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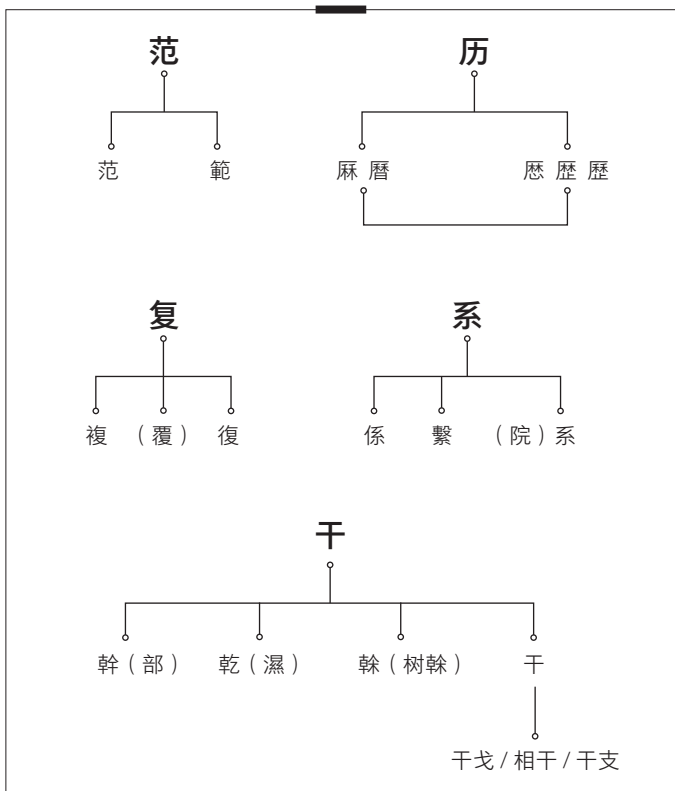
对我们自己的文字文化的长期忽视带来严重后果之一：

由于不识繁体字，造成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文字短板，乃至频频闹出笑话。我们做翻译研究的人，一定要补上这个短板，一定要做到“用简识繁”。以下是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汉字繁体字、异体字中不少承载着中华（文字）文化的丰富基因与相关的人文信息，整个汉字系统因此可谓是博大精深。我以为，作为中国学者，特别是从事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的学者，如果对自己民族的文字文化不甚了了，很难达到研究与实践的至臻境地。举“飏”字为例，请大家抽暇去查一下“飏”字的各种写法及来龙去脉，体验一下这个字里隐藏着的你未知的信息：

飏（飏） 飏（飏 飏） 𩇛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在的一个简体字，往往对应着两个以上的古汉字，在简转繁时非常容易出错！下面我列出五个简体字及与它们对应的古汉字或繁体字。请诸位有暇不妨专门再去查核一番，搞搞清楚：



1939年，我国商周时期的一只特大青铜鼎出土，被学者定名为“司母戊鼎”，且很长时间里一直沿用。因鼎的最重要功能是祭祀先祖与神灵，“司”通“祀”，当时此鼎解释为商王“祭祀母亲的鼎”，可以成立。但后来经过学者再考证，认定“司”乃是“后”的反写字，因而此鼎应为“后母戊鼎”更确切。现在国家博物馆已经据此将其更名。

为什么认定“司”是“后”的反写字？原来，在甲骨文或金文中，书写顺序和方向并不固定，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也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在汉字一些异体字群里至今仍可见到许多这种迹象，如：



除了汉语的文字知识外，我们的英文功夫也要不断锤炼，首先当然是要有相当的 input（英语语言文学的底子要比较厚实）。英文的使用不仅要流利，而且要地道（新鲜、锐利，跟上当代英美人的语言风格），要能写得体的英文文章（包括译写），且出手要快。

对英语语言的学习要充满兴趣，对细微之处要敏感。给大家举些例子。请注意下面句子中的划线词语，我以为它们用得非常贴切、轻巧、地道。这正是我们要学、要汲取的。

“China does not want a trade war with anyone, but China is not afraid of and will not recoil from a trade war,”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said in a statement late Thursday.

Fearing a possible trade war between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ies, worried investors rushed to park their money in the bond markets.

Tillerson also had a parting shot for Russia.

Philip did attend the Sunday morning Christmas service, waving to well-wishers on his way out of the church. As a concession to age and his cold, he drove to the church instead of walking.

有时，看起来不起眼的的一个词语或者翻译就可能是一个要好好琢磨的现象：

标识的读音：shi 还是 zhi？

科技的翻译：

◎国防科技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ce Technology

◎张江高科（园区）

Zhangjiang High Technology Park

为什么这两个翻译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总之，中英文的翻译推敲是无止境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付诸努力的事。

三、善思辩 (constantly sharpening your reasoning edge)

搞学术做学问，重要的是要有较强的思辩能力，而思辩能力不强在很大程度上却又是我国外文院系的学生（也包括相当一部分教师）的短板。中文底子欠厚，知识面显窄再加上不善思辩成为许多外文院系（包括翻译专业）走上社会后工作不适应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样，不善于思辩的人，也很难在学术研究上做出像样的成果，遑论会有创造性思维的展现。

要在学术研究上善于思辩，就一定要自觉养成一种批判性思考问题的习惯，即对任何理论或见解，不持迷信或盲从的态度，要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或考证、比较后，才去得出结论，而且对任何事物都要以辩证的态度或方式看待，要始终以发展的眼光对待。

外文院系（包括翻译院系）的学生和教师因为在语言的训练与积累方面要化去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还要同时修炼自己的汉语，扩大知识面，因此在学术研究上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可能会有限。但是无论如何，做学问如果没有一定的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是不能想象的。大量有成就的学者经验证明，学问要出彩，搞学问的人一定要有“闲”去琢磨问题，古人所谓的“精详出于暇豫，误处皆缘不学”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其实，个人独处、安静读书和与他人相聚交流、切磋是不矛盾的，应当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后者所能带来的启发还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因为在与别人（无论是同行还是别的学科的研究人员）交流时所碰撞出的思维火花也可能是书本上得不到的。古人云：学以问之，聚以辩之（包括今天所谓的 brainstorming）就很恰地点出了两者的平衡关系。因此，我们一定要寻找、建立必要的与同仁雅聚的平台。例如常去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借以会会同行专家，不时地与同仁有茶聊、喝咖啡的时间安排等。总之，要有一定的“闲”时间，这对扩充丰富自己的学术视野大有裨益，可以为自己的学问添彩。下面我引两段相关的语录（英文参考译文是我所为，仅供参考，下同）：

——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学记》

To pursue one's learning by always thinking alone without positive exchanges with others would very likely make a man ignorant of and ill-informed on wider scholarship.

(何译)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He who reads books but does not think is easy to be misled. He who thinks a lot but does not read books tends to be less confident.

(何译)

在我们讨论思辩问题时，我们可能还要分清楚两种思维的不同，这在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时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这两种思维大致归纳出西方与中国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异。在西方，搞学术研究完全可以是纯理论研究，其背后的动力是科学研究的理想主义，目标是“求真”，这种求真很重要的领域就是科学的基础研究。在中国，主导我们传统做学问的是一种实用思维，有非常明确的经世济用的追求，目标是“求善”。就翻译研究而言，西方出版的文献著作，大量的主题都围绕翻译的本质问题展开，对翻译的技术与操作层面较少涉及，甚至毫无关系；而在中国，情境就大不一样，我们的翻译研究文章或专论大多是翻译技术或操作层面的讨论，即使是理论问题也必定与实际问题挂钩。我们在选择学术研究方向时，一定要事先想好你的研究价值取向，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思辩路径。（对我国的翻译研究者而言，选择哪种研究取向还需要根据个人的兴趣、特长及特定的需要而定，在此我不作展开。）

四、望前沿 (commanding a panoramic view of your own research domain)

我这里所说的“望前沿”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全局性的，即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社科、人文及军事等的最新发展资讯要尽可能多的有所知晓，而且要多通过外文渠道进行了解。身处 21 世纪，不知大局者，难谋好一域。二是要时刻

关注国内外译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动向，除能博览群书之外，也要能博览群刊（群网），善于借鉴别人的研究思考成果。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利用好网络资源。通过这两个前沿的动态观望，寻找或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或题目。因此，“望前沿”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发现程序，特别是跨学科翻译研究的发现程序。只要我们能尽量结合自己的兴趣，及时将最新资讯、发展，包括推陈出新的内容等，融入进自己的学术思考，就完全可以使自己的研究既保持特色，又充满积极而有价值的动态变数。

五、勤笔耕（writing and translating diligently）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我们做翻译研究的人，自身要在外文与汉语的修炼上下功夫，而这两种功夫的试金石就是看你是否真的能写会译（包括译写 transwriting）。在高校教书的翻译研究者，特别是外文、翻译专业的教师，必须要有比较过硬的这两手功夫。不然你首先可能难以站稳讲坛。一个在中文、外文写作与移译上能拳打脚踢的翻译教师，无论是上翻译理论课或实践课，都会更容易与更多地让学生受益。

再则，现在，研究生与教师都有发表文章之需要，这当然意味着他们会写文章，而要会写文章，少不了先要练笔。文科、社会科学的师生传统上都属于文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使笔杆子，除能写学术论文外，还应能写各种应用性文字（如工作报告、总结、推荐信等），有条件有兴趣的话还要能写诗歌或散文等。这后者的写作最能体现文人的色彩。文字作品，包括学术论文在内，倘若“言而无文”，恐也“行之不远”。我们只消看看我国老一辈学者遗留给我们的大量文著，就可以深切体会到我们这代人与他们在文韵文风文采上的明显差距。

外文院系（包括翻译专业）的师生汉语不能生锈，外文更要努力达到精致水准。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一下，翻译专业的师生有一部分人从事口译。做口译不能只满足于吃“开口饭”，“做口腔体操”（陆谷孙语），一定要明确，口译的重要基础在于笔译，而笔译的基础又在于中外文的文字功夫。因此，口译教师或学生一定不能忽视自己的中外文的笔头锻炼。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经常自习翻译（无功利翻译）的必要性

与重要性。翻译院系的师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应当通过不断的翻译实践，练就翻译与译写的硬功夫，且最好能“左右开弓”，即既能外译汉，又能汉译外。而汉译外，包括译写（我称之为 trans-writing），有时是非常让人费周折的一件事，以下仅举一例，请大家评鉴一下我对南宋著名诗（词）人陆游一首脍炙人口的《钗头凤》中“错，错，错！”与“莫，莫，莫！”的英语译写，坦率地说，我为这六个字可谓绞尽脑汁，至今还未完全满意。

A prosaic translation of Lu You's *Ci Chaitoufeng*:

——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
几年离索。错、错、错。

Your tender hand holds a cup of wine, and in and outside the
city the spring season is prevailing. Yet, the spring wind could
turn cruel to blow away all the affections. The past several years
have witnessed my melancholy existence. Oh, a wrong act! a
fatal mistake! It's all my fault!

(何译)

——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锦书难托。莫、莫、莫！

Now comes spring again, but the person before me appears
emaciated and her handkerchief is wet from wiping tears too
much. The solemn pledge of love notwithstanding, the channel
of letter exchange is no longer there. Oh, my pains over the
irretrievable! The irrevocable! And the irredeemable!

(何译)

《詩文草書摘鈔》何刚强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p.67)

简单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可以归纳为这样几句话：
名符其实的翻译学者应当以自己的学识 / 学问和走笔来体现：

所见者真，所思者深，所写（译）者醇。